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三一期 ——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2c)

【史海钩沉】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武斗	金大陆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二十一)	孙怒涛
【渡尽劫波】	罗征启访谈录之“孙耘事件”	杨继绳
【史实辨析】	我亲身经历的北大文革中的保卫组和“7·10”事件	蓝绍江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武斗

• 金大陆 •

一、北京红卫兵南下

1966年9月11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人员到达上海，上海有关方面派出由摩托车开道的车队迎接，一路风风光光地进入位于市中心，紧靠人民广场的市体育宫安营扎寨（今上海大剧院的位置）。当天，南下兵团即以“全体战士”的名义在上海散发《宣言》，一方面声称这次是“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期望，首都革命人民的战斗友谊”而来的；一方面表态：第一，我们是战斗队，是旧世界天生的造反者，要造一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的反。第二，我们是学习队，要向上海的工农兵、红卫兵，向赴沪的其他红卫兵学习，永远做群众最恭谨的小学生。第三，我们是宣传队，要让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根据有关方面的安排，9月13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分别在上海第二棉纺织厂，与杨富珍、王林鹤、程德旺等40多名劳模座谈；在市学联，与上海学生代表举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北京红卫兵提出上海如何造反，如何抄家（被抄对象是否反抗、报复？抄家物资如何处理？），

上海红卫兵如何组织，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等问题。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依据统一的口径）一一作了介绍。最后，北京红卫兵对打人作了解释，强调北京的“阶级报复”很厉害，确实打死过一些“坏人”等。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开始正式介入上海的“文革”运动。

应该承认，首都红卫兵因受“派遣”而具有政治的优势；因人员众多，队伍整齐而具有组织的优势（其下属十六个纵队，分散在杨浦、虹口、静安、卢湾、黄浦、徐汇、长宁等区域）；因初来乍到就领受上海有关方面的关照而具有行动的优势。

二、现场之一：面上的行动

9月13日，就在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与上海劳模、学联代表举行座谈会，声称“是来上海学习的”时候，北京语言学院、外国语学院的下红卫兵奔走呼号，在上海的大街上散发铅印版传单《最最紧急的革命倡议》。《倡议》指出“现在，上海存在一种不能容忍的现象”，即一些“黑帮分子”仍然“养尊处优，逍遥法外”。所以向上海市全体红卫兵、广大工农兵群众倡议：凡“牛鬼蛇神”一律减薪；银行存款、电视机、照相机、沙发等一律没收上缴；保姆一律解雇；高级公寓、别墅一律搬出；白天一律进劳改队，晚上一律写交代；一律挂“牛鬼蛇神”牌，不准自行摘下等，以至要将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各路纵队主动与各区联系，广泛查摸“敌情”，反覆询问有关人员“抄了多少户？斗了多少人？斗服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甚至提出查看档案和大字报底稿，交出此前搜查的清单等。当晚，南下兵团即以徐汇区为重点，分别在卢湾、虹口、静安、黄浦、闸北等区实施抄家，约查抄五十多户。起初，北京红卫兵还“注意调查研究，组织得比较严密”，如徐汇区的行动组成立了“训话组（对家属）、“讯问组”（对本人）、搜查组、记录组、登记组（对搜查的东西进行登记）等。当发现原单位搜查不彻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便一边宣称“若在北京则基本扫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门进去，而是把门打坏了进去，不老实就揍”；一边向街道干部提议：“黑六类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们扫地出门好不好？”。

但北京红卫兵的这种克制只保持了一天。

第二天（14日晚），在卢湾区，130多名南下红卫兵分头搜查了三户。其中资本家虞某某（虞洽卿之子）夫妇被剪了头发。当时，红卫兵问其女儿，你站稳立场吗？答：站稳的。红卫兵就叫她用皮带抽打其父亲，她不肯，也被剃了发。一户被称为“洋奴”的是个八十多岁的瘫痪老头，北京红卫兵将其儿子、媳妇、女儿绑在浴室里，儿子被鞭打、搜查以后，将东西装了三卡车运到体育馆。在徐汇区，30多个北京南下兵团红卫兵在永福路某号陈某家搜查（原三青团分队长），将搜查对象的兄妹，其父的大小老婆等五人剃光头，并用皮带、长柄伞、火钳、拐杖等打抽。陈某说：“十六条讲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说“没有打死就是文斗”，把陈打得头部、胸部、背部皮肉裂开，处于昏迷状态。当时，红卫兵在门口把守着，街道干部和群众都不准入内，邻居则在屋外喊叫“要文斗，不要武斗”。据统计，至9月15日以前，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十个区共搜查了九十户左右，其中徐汇区搜查了五十八户，并在徐汇区、静安区举办了“资本家剥削罪证展览会”。其间共发生武斗48起，98个对象中82人被殴打，其余的是被剃阴阳头、罚跪、涂漆的。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广泛介绍北京对黑六类的武斗，认为上海太强调文斗。例如第十纵队在黄浦区的各个活动点上制造舆论，大肆宣扬“文斗是没斗”、“敌我矛盾就是用武斗”、“打死人没关系，花八元钱”（指火葬费）。以北大大学生为主的第七纵队在静安区活动时也宣传，北京已杀许多人，“就是要红色恐怖！”，“要乱，要大乱特乱，越乱越好，乱出一个铁打的江山，一

个崭新的世界”。正是具有这般强烈的意识，这般强烈的情绪，据9月15日至17日的三天统计，北京红卫兵打人30起，被打达百人以上。武斗往往利用晚上关门殴打，打后不准被打对象去医院，被打人有血迹的衣服要洗过，而且被打人天天换房间。由此可见，仅仅数天之间，北京红卫兵的武斗涉及面已经从“四类分子”、“资本家”，扩展到被认为有“问题”的“社会青年”、“游民”等；武斗方式已经从抄家现场的殴打，演变成私设刑室的摧残。这种归趋的必然性决定了北京红卫兵一定要在上海制造骚动和事端。

下面请看来自“面”上的数例行动报告：

9月15日，南下兵团红卫兵第五纵队进入龙华医院妇科主任陈家搜查，中医学院“文革”组织闻讯赶到，说明陈家已抄过五六次，为此双方发生争执。17日，北京红卫兵破门搜查，第二天又借陕西路小学开斗争会，将陈的老婆、子女、孙子一家均揪去，全家不分老小一概罚站、抄身、鞭打，还要吃柏油泥丸，其中陈多次被缚住手脚，口中塞布，推到在地用皮带、棍子抽打。经医检，陈腰以下及臀部皮肤呈青紫色，有肿痛，肩部、两肋、脸部、颈部也有伤痕。

9月17日下午4时，红卫兵南下兵团在天马电影制片厂广场台上揪斗了厂领导丁一，陪斗的有谢晋、徐昌霖、汤晓丹、顾而已、黄宗英、蒋天流等13人。北京红卫兵给丁一挂上“黑帮大红伞”的牌子，责令陪斗者“一个个交代罪行”。

9月21日上午8时至夜11时多，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听见隔壁中苏友谊馆传来叫喊救命的声音。从楼上窗口望去，看见被打的是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当晚，上图工作人员邀请中苏友谊馆、上海体育宫的负责人了解情况：参与打人的红卫兵属南下兵团十六纵队。被捉的人有“被抄家态度不好者”、“流氓阿飞”、“无执照小商贩”、“说北京红卫兵坏话”等。这批北京红卫兵从17日开始，打的人已有十四、五个。23日晚上，十六纵队红卫兵拉上窗帘（从缝隙中看到一白衬衫者跪在地上），继续在陈设毛主席半身塑像的房间里审讯打人，他们打他耳光，有七、八人用束腰的皮带抽打。当晚12时，上图群众请来师大七、八十个红卫兵，不仅派出代表与南下兵团指挥部交涉，还强行察看了十六纵队的打人场所，看到在押的6人已被打得躺在地下。

9月25日晚八时，北京红卫兵查抄徐汇区永福路某号肖某家（肖某72岁，曾任国民党驻使馆参赞、外交部秘书。时任市人委参事），责令交出手枪（因其儿子单位抄家时抄出子弹），肖交代“手枪留在法国”。北京红卫兵将他脱光衣服，只剩一条短裤，用皮带抽打得很厉害。凌晨三时，肖死亡。

应该承认，恰如北京红卫兵所宣称的：“在上海必须造成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现象”，那就是通过“革命”（武斗），清晰阶级阵线，教训阶级敌人。其实，这些“恐怖现象”在一些重点单位的发生，则更加惊心动魄。

三、现场之二：点上的行动

下面请看来自“点”上的行动报告。

上音（附中）事件：

9月13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12名红卫兵（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生），乘三轮卡、摩托车，带着电影摄影机来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他们在车上高唱“鬼见愁”歌，在大

门口、各大楼和行道上写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接着，他们与校内的红卫兵造反派串联，来到接待组，责问该院红五类子弟所占比例？教师队伍家庭出身情况如何？这批北京红卫兵还斗了贺绿汀，往贺脸上吐沫，并叫贺下跪，脱鞋脱衣。晚上，这批北京红卫兵提出住在上音（市接待站已安排在化工学院），表示“住定了，不走了”。

16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120人强行住进上音南楼（男二楼、女四楼。主要为北京工学院和北京四中、七中、九中的学生）。他们宣称“上音红五类子弟只占30%，是黑帮统治”。第二天晚8时，第七纵队红卫兵用拖车把贺绿汀夫妇从家中拖至附中，到达时，贺的头被巨布缠绕起来，贺妻姜瑞芝已被打得披头散发，斗争中，贺夫妇被剪了头发，并在脸上涂了墨汁，还被打耳光、下跪……

19日晚7时，上音附中红卫兵造反派伙同第七纵队红卫兵一起对贺夫妇拳打脚踢，用皮带抽打，贺被打倒在地上翻滚。他们还叫姜瑞芝跪在地上，在姜的背上放一把椅子，然后就轮流坐上椅子用皮带抽打。当时，姜的哭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多次打电话给音乐学院，上音师生再三要求他们停手，他们置之不理，反而越打越凶，贺夫妇一直被打到十一点。

上外附中事件：

9月15日下午1时，属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十六纵队的北京外语学校学生11人，带着照相机和手提扩音器来到上外附中，宣称“北京运动轰轰烈烈，资产阶级狗崽子已威风扫地”，与该校红卫兵一起高呼“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该校参与行动的多为高干、革干子弟，动武者约五十人左右）。4时左右，这批红卫兵砸碎窗子，破门进入校长室，用旋凿撬开抽屉，拿走了公章，拆走了电话机（装到红卫兵营部）。接着，这批红卫兵又勒令总务主任交出钥匙，打开保险箱，拿走了支票本（后经劝说还回），但公章拒不交还，还说：“这是夺权。”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教师中的红卫兵不敢出来讲话，支书吓得躲在办公室的橱子后面。当晚，该校红卫兵便分头外出抄家。与此同时，这批制造事端的北京红卫兵和该校红卫兵骨干召开会议，策划第二天“如何使资产阶级威风扫地”的行动计划，直至深夜。

16日清晨，该校红卫兵营在校园里贴出“实行红色恐怖”的勒令布告。6时左右，教师们陆续到校，即被红卫兵拦住，逼令填写成份。随后，红卫兵广播令教师集中，按成份排队，强迫所有成份不好者剪发，“当即有五名女教师剪成“阴阳头”和“花头”，男教师都剃成光头。接着再揪至校门口罚跪、脸上涂墨，衣服上画上乌龟，写上“混蛋”、“王八蛋”、“狗崽子”、“资产阶级分子”、“大右派”等字样，胸前挂‘牛鬼蛇神’牌子，并强令他们相互骂打，谁不打不骂或打轻了，就用脚踢，用木棍、铁的大钳戳、推。当时有拉拖车的工人路过该校门口，停车劝告被赶走，还被指认“他们这些工人一定不是好人。”

9时许，又一批约20多人的北京红卫兵增援到校。一女教师（因转移黄金到校被红卫兵搜出）趴在长凳子底下，两手举起，这时一学生（一北京女红卫兵）在她背上踩了一脚，头碰在水泥地上，随即地上出现一摊鲜血，几个红卫兵还逼着她把地上的血吃掉。

中午11时左右，红卫兵强迫所有的人（被批斗者）赤脚，有的还被迫嘴里衔着一只鞋子、一只袜子进行劳动，有的将鞋子挂在脖子上（笔者按：此处应指“生活作风”、“男女问题”者），个别还挂着大砖块。当时，教职工大多表示不满，却都很怕，有的躲在教室里，有的躲在家里。同学们也都不敢声张，非红五类子弟说：“我们讲了话，也要被剃头的。”有同学几次找支部出来讲话，但没有一个敢出来，全体党员也是如此。

下午3时半，红卫兵集中对被批斗者训话，读毛主席语录，然后为被批斗者拍照，有集体

照、个别照，也有将问题严重的一男二女合起来拍。最后，又逼迫所有被批斗者在楼梯上跑上跑下。

晚6时，被批斗者中有9人押送派出所，其余自己回家。过往的工人见一些教师赤着脚走在马路上，一致认为“这样做是违背党的政策的”，而这批首都南下兵团的红卫兵们则兴致勃勃，认为“上海比北京搞得痛快，越搞越有劲了”。据统计，上外附中的这次行动共斗争了31人（占该校教职工的20%）。家庭出身情况为：地主3人、资产阶级5人、小业主1人，职员2人。政治情况为：中共党员3人，共青团员7人。有关材料认为“仅4人问题较严重”。31人中，有怀孕者、哺乳者、高血压症患者各1人，还有一人准备当天结婚，因参加运动而来校。

四、辨析与思考

围绕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在上海的活动，应有一系列的追问和探究，其中既有事实的辨析，更有问题的思考。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行动，引出文革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命题：为什么“文革”运动初期会发生以“暴力”对待“非暴力”为特征的武斗？且以北京红卫兵为典型？

关于“武斗源”：中国“文革”运动初期的“武斗源”在北京。1966年6月18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即发生游斗、殴打六十多名教员和干部的武斗事件，北大工作组曾出面制止。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便三次在北大召开全校万人大会，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结果，当着江青等人及上万北大师生的面，北大红卫兵将斗争对象揪上台，演示了挂黑牌、戴高帽、拳打脚踢、用铜头皮带抽打等。就此，武斗不但合法化了，而且迅速地在北京和全国普及。

针对社会上越演越烈的武斗情况，8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谁知在听取了各方的汇报发言后，毛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毛泽东传1949—1976》的作者逢先知、金冲及评论说：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此后，北京的暴力进一步升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红卫兵从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如火如荼的现场，来到上海相对冷清、和缓 and 克制的现场，必定要移植北京的武斗来打开局面，来显扬和证实一切。

如果说对“武斗源”的确认属事实性的判断，即它在事由的层面上解说了发生的来路，那么值得追问的是：北京红卫兵面对“非暴力”的徒手对象，其崇尚暴力、施展暴力的思想理路是什么呢？内心冲动是什么呢？人性承担在哪呢？这里仅谈两点原因。

首先，是“教育缺失”。诚然，十七年在数理教育方面确有成效，但在政治教育方面，它既没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良知、慈爱、宽厚、温良、中庸、和谐等义理，给青少年以道德的熏陶；又没有宣扬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博爱、人权、慈善等精神，给青少年以文化的启蒙。尤其临近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年，整个教育的主题不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诉苦把冤伸”的阶级教育；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结果，青少年们的思想、情感被一种仇恨的意绪所浸沉；意志、欲念被一种战斗的渴望所振刷，以至当“文革”爆发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的塑造自然衍变成武斗的行动了。

其次，是“非常时代”与“精神世界”。“文革”标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实际上是破除法律、道德、纪律和规则的正常管束，放纵了批判和斗争的自由。然而，当这种批判和斗争披挂着革命的旗幡，成为阶级斗争的展开时，实际上也就放纵了暴力。由此，“文革”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构造了一个“非常时代”。作为这个“非常时代”的前驱者，红卫兵不仅满怀着战斗的冲动，更在“精神世界”里搭建了攀援理想之国的梯架。这个理想之国就是“彻底铲除帝修反”，“创立一个毛泽东主义光辉灿烂的红色新世界”，在红卫兵的“精神世界”里，充斥着为理想所蛊惑的激情。然而，这种理想是要通过革命造反来达到的，是要通过武斗来表现的，这便是一条充满刺激和疯狂的理想之路，以至这种理想并不旷远，而很狭窄；并不宽厚，而很尖利；并不和谐，而很激荡。正是这种虚幻的情怀和僭妄的情绪的混合，红卫兵的群体人格在“非常时代”中背离了求学期的生态（学生身份），完成了向战士身份的突变。应该承认，1966年时的红卫兵武斗是少有功利的（1967以后的两派武斗则与权利和利益相关联），如果说仅此一点在红卫兵的“精神世界”里还沾染了理想的色彩，那么它的主义之上的执迷，它的现场之中的暴戾，它的天理之下的忤逆，恰恰是正常人格发生解体的确证。因之，红卫兵在“非常时代”崇尚武斗就不是偶然了。

作者附记：本文引用了一部分“文革”中的简报，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 摘自：《世纪》2009年第1期

~~~~~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二十一）

• 孙怒涛 •

〔上接Zk1310a，第七章 414的外战和内斗（1967.6—1968.9）〕

#### 第二十七节 一封加急电报，在大武斗爆发前夕把我拽回家

高校学习班以围剿派性为突破口，期望实现大联合。但是，派性只是问题本质的表象，仅仅围剿派性无法解决两派之间的深刻分歧，难以调和两派之间的尖锐矛盾。

高校学习班的无果而终，为北京市高校的校园武斗之风打开了闸门。

北大也有类似于清华的两派，一派是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它的对立派是“北大井冈山兵团”，据说人数也不少。1968年3月29日凌晨，北大发生了武斗，聂元梓把“北大井冈山”打得惨不忍睹。以谢富治为首的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表态坚决支持聂元梓，向被（用试电笔）“刺伤”的聂元梓表示慰问，严厉批评了“北大井冈山”，责令其交出“凶手”。此后“北大井冈山”被上压下打，陷入困境。

中央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是给蒯大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只要你敢打，有能力打，把414打趴下了，打跑了，上层都会支持你的！

4月10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里，发表了毛泽东最新的一段“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

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一指示把文革的性质提到国共斗争继续的高度，为已经势不两立的清华两派斗争火上加油、煽风助力。

这期间，团派加紧炮制“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作为伸向4 1 4的黑手以便在政治上打垮4 1 4，同时加紧武斗的舆论准备。我知道在4 1 4这边，也在积极做着应对武斗的各项准备，包括加强科学馆的防卫，加紧“学习班”队伍的建设。

4月中旬的学校气氛，日紧一日，紧张得让我窒息。

4月20日晚，我正在礼堂的大字报区走走、停停、看看。与平时一样，大字报区灯火通明。那些派战的大字报依旧言词激烈、派性十足。听到的广播依旧慷慨激昂、声嘶力竭。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继续的最新指示回荡在清华园上空。只是，我明显地感觉到这几天团派的广播里比往日多了一丝杀气。我似乎已经嗅出了空气中有一股血腥的味道，似乎听到武斗的脚步声越来越响、越来越逼近。清华园里，就像是大决战的前夜，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强烈的直觉是，两派的武斗已经不可避免，随时都可能发生，只是不知道在哪一天哪一刻由哪一根导火索而引爆。

突然，我班的一个老四看到了我，跑上前来对我说：找你找得好苦呀！我问他什么事，他给我递上一封电报。

这是一封加急的电报。我的心乒的一下提了上来，立即涌上一阵不祥的预感。

那个年代，对穷学生而言，唯一的通讯手段是信件。上大学以后，父亲规定我每个月必须要写一封家书报平安。我经常因为忘记而拖延。为此，他每次都在来信中附上8分邮票，以防我借口没钱不及时回信。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接听过长途电话，也没收到过电报。我看到别的同学接到的电报多数都是因为家中有十万火急的大事。

我急忙拆开电报，一看，是老家发来的。只有这寥寥五个字：“母病危速归”！

我的脑袋一下就炸开了。我知道，要不是万不得已，家里绝对不会给我发电报，尤其是加急电报的。

我几乎连想也没有想就拿定了主意：立即回家！

我没找王允方。如果我有犹豫不决的事情，我肯定要找他商量的。在这件事情上，再去找他只能耽误我的时间。

但是我知道事情再紧急也必须告诉4 1 4总部，不能不辞而别。沈如槐不好找，我知道汲鹏在哪里。找到汲鹏，我把电报拿给他看，说，我是独子，我必须得马上回家。我说我不能再浪费时间找沈如槐了，请他转告沈如槐我离校的原因，代我请假。

汲鹏深表理解。他一再安慰我，叫我别着急。我回宿舍拿了点最简单的东西。汲鹏送我到南校门车站。我到北京站买了一张最早是第二天早上8点发车的火车票。那晚我在火车站一夜无眠，焦虑不安。

在火车上，我紧张的心慢慢的冷静了下来。我一边担心着母亲的病情，一边想：我就这样离开4 1 4了？我这样的突然离开是不是对4 1 4的不负责任？会不会对4 1 4造成伤害或者

损失？会不会给团派的造谣攻击提供了炮弹？我脑子里乱哄哄的，理也理不清。

只有一点我是很清晰的：如果我要是因为留在学校里而见不到母亲的最后一面，我将自责、悔恨一辈子！我甚至可以想象，我不能为母亲披麻送终的话，母亲的口眼都不会闭的。我的那些亲戚，我的那些乡亲，如果见不到我这个独养儿子侍候在母亲的病榻前，跪拜在母亲的灵堂上，他们的唾沫星子都会把我淹死的！

我宽慰自己，414里还有那么多头头，个个都比我有能耐。虽然我是第二号头头，毕竟对414来说，有我一个不算多，没我一个不算少。而我在家里，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我是无法由别人替代的，是万万不能缺席的。

古人有句话叫“忠孝不能两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领袖的“忠”。回家探望病危中的母亲，这是我一个人的“孝”。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在忠孝难两全的时候，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忠”而舍弃“孝”。可是，轮到我要抉择“忠”或“孝”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犹豫就选择了“孝”。想到这，我羞愧无比，无地自容。关键时刻，我在414与母亲之间选择了后者。这可能就是我没有“大公无私”的政治觉悟吧？我一边检讨自己、反省自己，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丁点在下一站跳下火车重回学校的念头。我只是想尽快回到家里见到母亲。

在矛盾、不安、内疚、牵挂、痛苦、急切的情感纠葛中，我到了上海。父亲在上海一个厂里的食堂当大师傅。我想先到父亲工作的厂子里看看他在不在，是不是已经先回家去了。

父亲在厂里。而且父亲并不知道母亲病危的消息。这就有点奇怪了。我们商量了一会儿，怎么也没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无法给家里打电话，因为我家的小村庄里没有电话，离公社又很远。父亲叫我马上回家看看，把家里的情况赶快告诉他。

还没容我动身呢，当天晚上，我就发烧了，腹部也疼痛难受。

这下父亲为难了。是留我在上海看病呢，还是回家看望我母亲呢？老家的电报上写得那么凶险，当然是应该立即回老家的。我的病还没有到危急的程度，要看病，回到乡下再看病也不迟。于是，父亲请了假，与我一起回老家。

坐了一天的火车，再乘汽车，再步行好几里路，终于到了家里。

乡亲们见到我回来了，都嚷嚷，这下好了，可盼回来了。母亲在里间床上躺着。听见外面的喧哗声，看到我进来，硬撑着想起来。我看到她病容满面，干瘦无力。她的身体一直不算好，整年都是病怏怏的样子。前些日子县城里发生武斗死了人，最近听别人说北京也发生了武斗，她马上就想到她的宝贝儿子。思念心切，急火攻心，一下子就病倒了。邻居很着急，商量出主意。有个姓唐的邻居是当过兵的，见多识广。他说那就赶快打电报叫银基回来，还要加急的。我母亲怕把我吓着了。他说，你本来就病着，不说得重一点，不加急，你儿子能回来吗？于是他专程跑到慈溪县城里，给我拍发了这份加急电报。

我母亲的病是心病加疾病。现在看到我回来了，心病好了一大半，挣扎着爬了起来。我看到她还能这样动弹，稍微放下了点心。

我对母亲有点责怪。我说她：“你还没到病危的程度呢，怎么好打这样的电报催我回来的呀？我都吓死了！”她一听就恼了，说：“你真的要我到了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快死了才能叫你回来奔



丧吗？我都病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还不重呀？你来信的时候经常说，为了保卫毛主席，流血牺牲也不怕。你不怕，我怕死了。听说北京在搞武斗，我就你一个儿子，你死了，我靠谁去啊？”说着说着，她伤心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了起来，骂我没良心的。我心里只是因为觉得对不起414，才说她一句。也觉得我刚才的话伤了她的心。被她一骂，我手足无措，惶恐不安，赶紧沉默不语。

母亲的病刚有点起色，我的病倒变得重起来了。每天都是腹痛、发烧、盗汗。去慈溪、余姚、甚至宁波的医院看过病，检查中发现腹部有一个明显可触及的硬块，化验指标也不正常。各家医院的医生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肿块，有的说是瘤子，有是说是结核，还有甚至怀疑是癌症的。因为病因不明，难以对症下药，所以吃药打针都没什么明显的疗效。

5月上旬，我得知清华发生武斗了。这消息对我来说并不感到十分意外，但是心里还是沉甸甸的。武斗的具体情况一点都不清楚。1。4武斗只打了一晚上。我想这次可能也是这样打了一仗吧？不知道打过以后又会太平几天？回校后知道居然打了差不多一百天，居然伤亡了那么多人，这是完全超出我的预料和想象的。

大概到了5月中旬，村里有好心人告诉我们，说是在慈溪城里碰到有人在打听我的消息。

这下父母亲紧张了。他们担心是不是蒯大富从北京派人来抓我了？

我估量了一下，心想，团派千里迢迢地派人跑到浙江来抓我，不太可能的吧？我已经离开了学校，再绑架我有什么必要，有什么价值？难道真的要对我赶尽杀绝？

我对父母说，不太可能是冲着我来。我怀疑这个消息是不是弄错了或听错了。父母说，不太可能，不等于没有可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是万一真的是来抓你的呢？那就不得了啊！

他们的担心自有他们的道理。县城里有一位老师是一派的笔杆子，写过派性文章，另一派对他很恨，于是，出动了几个人，半夜里把他从被窝里抓出来，绑到山坳里，用乱石把他砸死了。据说那老师跪地哀求也没用，还是死了。这件事在我们村子里传得妇孺皆知，谈之色变。

一想到可能发生这样可怕的惨剧，父母亲就沉不住气了。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出外避避风头。我虽然觉得自己与老蒯并没有那么大的深仇大恨，但是说不定有个别老团对我很恨的，如1。4武斗谈判时有人要砸得我脑袋开花一样（这档事我没敢对父母说）。既然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老团不会来抓我，我就只好听从父母的安排了。

因为我病痛无法走路远行，当晚，借了一条农用船，请了本家的一位叔伯摇船，载着我去二姨家。她家离我家有十来里路，外人要辗转寻到二姨家，总要多费不少周折。

风高月黑之夜投奔亲戚家，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逃难。只听到单调的摇橹声，小船破水而行的哗哗声，谁也没有心情说闲话。我在二姨家待了一个多星期。老家周围好像没有再发现异常的情况。久待在外，也不是长远之计，于是回家。

老团来抓我可能是一场虚惊，我的病痛却是实实在在的困扰。因为一直未见我的病情好转，父亲也不能老是在家里待着。他嘱咐我继续看病，多长点心眼关注周围，忧心忡忡地回上海做工去了。

小村子里，没有报纸可看，消息很闭塞。公社的广播是有的，每家都有一只失真严重的小喇叭。我家那只喇叭哑了，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我要听广播，就得到邻居家去。喇叭里讲的总是形势一片大好。邻居们晚饭后聊天的消息真假难分，多数都是道听途说，有的我一听居然还是半年一年前的旧“新闻”。

学生可以停课闹革命，工人也可以停产闹革命，农民还得起早摸黑地干活。他们说，城里人不干活照样拿工资，我们不干活，误了庄稼，最后就得饿肚子喝西北风，谁管你呀。运动经历得多了，农民自有一套应付的办法。运动来了先顺着，不顺着那是要吃眼前苦头的。风头过了该干啥就干啥。所以，1968年的夏秋天，我家的小村子里，文化大革命也好，武化大革命也好，只是在广播里响着，标语里贴着，饭后扎堆闲聊时谈着。除此之外，感觉不到文化大革命的踪影。

没有学校的消息，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再发生武斗，不知道两派的争斗怎么样了，也不知道我的离校对老四有多大的负面影响，心中的思念绵绵无期。

人一旦离开原有的环境，往往会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除了生病看病，我无所事事。在这比较宁静的乡村里，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想一些问题。

看着农民披星戴月辛劳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想要是没有他们，我们饿着肚子还有力气来打派仗吗？文革还能再坚持几年？学生已经两年没上课了，工人已经两年没心思好好做工了，社会乱哄哄的，难道这就是文革？我们在学校里你争我斗的究竟有多少意义？

我对打派仗已经厌烦了。甚至，我对文革也感觉没意思了。说句心里话，不要说我现在病着回不了学校，如果我病好了，康复了，我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回去再打派仗了。

在家几个月中，从北京寄来的信件极少，其中有一封是陈楚三给我寄来的。他在信中简约地介绍了学校里的形势，并用了一个“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典故。陈楚三是博学之人，这一典故的意思我依稀是知道的，所以对他的这封信印象深刻。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尽管“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有矛盾也有争吵，但是毕竟是同舟共济的墙内兄弟，相同点远多于分歧点。在这414存亡的危急关头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他希望我能尽早返校。

收到这封信之后，我思绪起伏、辗转难眠。

我被众多的414战友推拥着做了414头头，我也用我的观点和行动影响着众多的师生裹卷到414这个群体里来。而在现时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口，我却不在他们的身边，没有与他们一起战斗，我内心非常的歉疚和痛苦！我深深地觉得对不起他们，无颜再见到他们。我比较胆小，但是我也并不是怕死鬼。只要与大家在一起，我就有胆量和勇气。要不是因为母病，我绝对不会逃避离校，肯定会参加这场武斗的。我反感武斗，反对武斗。但是当武斗无可避免地降临到我头上的时候，我也会参加武斗，犹如在1.4武斗中那样。我可能不敢一个人单挑独斗，但只要是在集体里我也敢于上场拼斗。

但是，理智告诉我，武斗是错的，武斗是没有出路的。我知道414是被迫参加这场武斗的。但是一旦武斗打响，就很难分得清正义或非正义。武斗就是靠拳头说话，无法讲什么道理。我不知道414该怎么应对这场武斗才算是正确的，但是我知道即使414被迫参加武斗也同样要承担责任的。

从情感上说，我应该听陈楚三的话，回学校去，与我的414弟兄们患难与共，战斗在一

起，要么胜利在一起，要么死也死在一起。从理智上说，我不应该再回学校去参加明知是不应该的武斗，尤其是已经出来了。情感与理智的纠缠撕裂着我，我痛苦万分！那种情感愧疚的痛苦，精神折磨的痛苦，远胜过躯体病痛的痛苦。

如果我的身体没病，我不知道我会做怎么样的抉择。幸好我一直病着。理智的思考和带病的躯体，决定了我即使想回校也无法回校。

我想，陈楚三肯定一直在殷殷期盼我的回信。沈如槐等一定也期待着我尽快返校助他一臂之力。我无颜、也无言回复他们。

到了8月初，我从广播里听到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的消息。我热泪盈眶！心想这一下清华的局势必将发生重大的有利变化。后来父亲也来信说，听人说北京的武斗已经停止了，既然我的毛病在乡下治不好，要我赶快到上海就医，久拖着总不是一回事。8月18日，我到了上海。先去的是地段医院，最后去的是华山医院。

华山医院到底是名医院大医院。医生检查后说，结核肿块的可能性最大。这与我自己的判断相吻合。1966年底我在南宁生病就是结核性胸膜炎，这是病史。低烧、盗汗、血沉超标等也都符合结核病的症状。只是结核病怎么会在腹部有那么大的肿块，乡下医生解释不了。华山医院的医生说，要确诊，必须剖腹探查。我问，怎么剖腹探查？回答是：“打开腹腔，活体检查，是什么性质的肿块就作相应处理。”我问能保守疗法吗？医生说，当然也是可以的，只是什么时候才能吸收这么大的肿块，谁也不知道，可能要一年半载，也可能要拖上三年五年的。医生最后加上一句：“要是万一不是结核肿块而是肿瘤呢？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想到这种“万一”，想到即使是结核肿块也可能要拖个几年，那还怎么参加工作？我决定还是动手术为好。是什么就当什么治，干净利索，比拖着半死不活的要强。

9月5日，住进了华山医院。我动手术的时候是半身麻醉，脑子是清醒的。手术刀的刀锋在肚皮上轻轻一划微微的痛感以及肚子切开一条缝以后被医生拉扯开来的感觉，现在还能回想得起来。肠子被捣腾了一阵。听得一个护士轻声地叫道：“是结核！是结核！”不一会儿，一只搪瓷盘端到我的跟前，我微侧脑袋斜看了一眼，两个肿块宛如从老母鸡肚子里取出来的两只软皮鸡蛋。术后我问医生，肿块都取出来了吗？医生说只取了两个最大的肿块。我问为什么不全取出来？他说，小一点的肿块要靠机体自身慢慢吸收，如果要全部取完，那就要把你的肠系膜全都剥掉，能行吗？

活体切片检查结果证实确是结核性肿块。后来问了医生，我才知道我这毛病全名叫“肠系膜淋巴结结核”，是结核菌活动到肠系膜上的结果。上一次，结核菌跑到胸膜里，就得了结核性胸膜炎。因为没好好休息，一直瞎折腾，所以结核病菌就活动到肠系膜去了。医生警告我，这次一定要坚持治疗，让体内无数个细小肿块都吸收掉。要加强营养，注意休息，尤其不要熬夜，老老实实的全体半年以上。要是不治好，将来结核菌跑到骨头里就是骨结核，跑到脑子里就是脑结核。医生的话吓得我一愣一愣的。

这次手术的后遗症之一就是在2000年前后的六七年间我已经先后得过三次肠梗阻——肠子套叠、嵌闭或扭转，其中一次又动了手术。医生说，上海那次手术后的肠粘连是肠梗阻最可能的诱因。肠梗阻没有有效的预防办法。一想到以后可能还会得N次肠梗阻，真想在肚皮上装上一根拉链以备急用。

手术当晚，麻药过了，疼得厉害。躺也不行，坐也不行，侧身不行，仰面也不行。这一晚

上翻来覆去的，难受极了。老爸陪着我，把他也折腾得够呛。

病房里有一个思想特别积极的病友，他每天都要带着全室病友做早请示晚汇报。那时候的早请示晚汇报大体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程序：全体肃立，唱革命歌曲（最经典的是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念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右手高举有节奏地挥舞红宝书，高喊：“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样，就算礼成了。要是碰到这样的早请示晚汇报不参加，那就是对毛主席的不敬不忠，麻烦就大了。出身不好的，马上被抓个“现行（反革命）”也说不准的。

我动手术后的第一天，无法下床，疼得呲牙咧嘴的，那位带头病友见了，瞧我这样，随我去了。第二天早上，疼痛好一点了，但是下不了床。那位带头病友见我仍然不想跟着做早请示的样子，不高兴了，说：“怎么这样娇气的呀？”我问：“坐在床上行吗？”“不行！”他说，“早请示是一项很严肃的活动，怎么能坐着做呢？”我没办法，只得下床，佝偻着腰，扶着床沿，痛苦地比划着，嘴巴蠕动着。尽管这样，那位带头病友还瞟过来不满的眼色。

住了14天院。出院后，休息了几天。我心里惦记学校。离校5个月了，学校里的形势肯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工宣队进校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想赶快回去。9月25日，我返回学校。

这一回去，我的身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真正由学生变成教师了。

我们这一批66届的毕业生是按1967年9月毕业的。也就是说，我们上了7年本科。这在中国，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实际上我们是到1967年的年底才正式分配完毕（极少数待分配的以外）。我是1968年2月17日向学校报的到，成为清华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其实那天只是办了个手续而已。学校里打着派仗，我依然是派头头，没有一点做教师的感觉，只是从此每月可以拿见习工资了。

## 第八章 留校任教但文革仍在继续（1968。10—1980。10）

### 第一节 去头头学习班“投案”，被工宣队拒收

到了学校，已经没有了两派的激烈争斗，此时已是工宣队的一统天下。碰到熟人，也只是匆匆地聊上简单的几句话，没有多大的兴趣和心情谈更多的情况。我只知道，我离校以后的这段时间里，两派发生了死伤多人的大武斗。七二七那天，工宣队死伤惨重。至于武斗何等的惨烈，一直不是很清楚。在414最艰难最危急的这些日子里我离开了战友，这是我最感内疚最感羞愧的事情，所以我也无颜向我的好友详细了解武斗期间的情况。此后听到的，也都是零零碎碎的片段，残缺不全的局部。直到看了沈如槐写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和唐金鹤写的《倒下的英才》，我才对百日大武斗有了比较全面完整的了解。

因为身体还未痊愈，刚回校先休息了十来天。后来我想，既然已经回校，学校秩序已经恢复正常，现在是工宣队的天下，我不敢完全给自己放假。我回到了教研组，先是半休，不多久基本上是全时参加运动。

在教研组里的活动主要是学习。两派停止活动了，工宣队掌权了，这个时候的打倒派性斗私批修才真正开始取得实际的效果。

听说两派的头头都在大联委学习班里办班，我与教研组里一位信得过的老师商量，我要不

要去参加学习班？他说被工宣队点名了再去总是比较被动的。我觉得也是。主动去，起码表示自己的态度是积极诚恳的，并没有想有意逃避。

我跑到工字厅古月堂，找到一位工宣队的负责人。我问他，我这样的人要不要参加大联委学习班呀？

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了。他对我这个名字好像没听说过似的，一点也不熟悉。

他又问我，原来干嘛的？我说我是4 1 4的头头。我没敢炫耀自己是4 1 4的第二号头头。

他再问我，参加武斗了吗？我说没有参加武斗，刚从老家回来。

他不再与我多说什么了，手一摆，说，既然没参加武斗，那就不必参加学习班了，还是回你原来的单位参加运动去吧。

呵，有这样的好事？我像是去自首当场被无罪赦免了一样，转身就回来了。心想，是你们不收留我的，又不是我故意逃避的。我知道，在教研组里参加运动，远比在学习班里办班，心情要放松得多。

估计工宣队进校之前，以为清华的两派，毛泽东支持的全国闻名的蒯大富领导的团派一定是革命左派。反对左派的4 1 4肯定就是挑起武斗的保守派了。没想到七二七那天，团派让工宣队死伤了那么多人，而4 1 4是欢迎工宣队的。工宣队对团派的愤懑是可想而知的。要是我是团派头头去自投罗网，也有可能照收不误。对一个他不熟悉又没参加武斗的4 1 4头头，工宣队就不是很感兴趣，把我打发走了。

虽然没有参加大联委学习班，工宣队并没有把我这个头头完全忘掉。系里的、教研组的工宣队要求我写交代揭发材料。交代是交代自己的问题和罪行，揭发是揭发别人的问题和罪行。我所交代的第一个错误是“反对谢富治同志”。此后还交代了第二、第三、第N个错误。

工宣队进校以后，除了给头头办学习班、追查杀人凶犯、整肃派性以外，就是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把全校师生员工专注在两派争斗上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斗争大方向上去。

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把隐藏在群众中的地主、富农、反革命、美蒋苏修特务、叛徒、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与文革前二年揪斗各地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完全不同，清理阶级队伍完全是矛头向下的运动，据说是为了打掉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分清敌我阶级阵线。

地、富、反、坏、右分子是“死狗”，当然需要在运动的烈火中一烧再烧的。十几年来，他们翻来覆去的被斗过多少次，可能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了。重点是要把那些还没有暴露出来的隐藏极深的阶级敌人即使掘地三尺也要一个不拉的统统挖出来。这是一场“人民战争”。于是，阶级敌人的队伍急速膨胀，畏罪自杀的人数迅速上升。

在大礼堂前面的草坪上经常召开全校教职员工的万人大会。大会的肃杀气氛足以让有点历史问题的人心惊胆战、两腿发软。其中有一排队伍是各单位揪出来的阶级敌人。有一天我发现有一位教过我外语的和蔼可亲的女教师也排在这排队队伍的末尾。见到我，一脸尴尬和不安。我心想，怎么她也被揪出来了？难道也是阶级敌人？

清理阶级队伍这场运动期间，自杀的人数是清华文革中最多的阶段。那时，对自杀的消息是严格保密的，我只是偶有风闻。

自控系是1958年刚成立的新系，教师都比较年轻，不像基础课教研室、土建系、水利系等这些单位里有历史问题的“老家伙”比较多。我所在的教研组有十几个年轻教师，都没什么历史问题，顺利地闯过了这一关。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渡尽劫波】

罗征启访谈录之“孙耘事件”

• 杨继绳 •

罗征启，1934年出生，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清华大学党委原副书记。1983年任深圳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1985至1989年任深圳大学校长。现为深圳市清华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时间：2009年2月17日下午至19日下午

地点：深圳市清华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访谈人：杨继绳

杨：文革期间，您和您的家人遭受了严重的迫害。您文革前的职务仅仅是清华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而您受迫害的严重程度远超过校一级领导，这其中有什么特殊情况？

罗：原因很多，但主要可能与1967年周泉缨的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有关。当时学校分为两派：井冈山兵团总部（因其核心的战斗组以林彪指挥的“28团”命名，故自称“团派”、“老团儿”）和井冈山四一四总部（因成立于1967年4月14日，故简称“四一四”、“老四”）。“团派”以蒯大富为首，因有是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撑腰支持，是掌权的；“四一四”是比较温和的一派，是在野的。大部分党员干部和许多教师是倾向或支持“四一四”的。我也是支持“四一四”的。

1967年7月中旬，两位支持“四一四”的政治课教师范德清、魏宏森告诉我“四一四”“云水怒”战斗组的周泉缨（汽六班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有新意，但比较粗糙，需要加工，让我帮助修改。参加修改这篇文章的有万润南（土木系给0班学生）、李兆汉（建筑系教师，当时在校刊《新清华》任编辑）。我们详细研究了这篇文章，认为的确是有新意，主要是第一，用河南的“河造总”和“二七”的分歧、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的分歧说明大学和社会上的争论及分歧，是与中央内部有分歧、争论密切相关的。虽然有些话并没有道出，但周泉缨在私下里却明确指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中央文革把持的一个大杂烩，社会上，大学里这样混乱，中央是不可能平静的。第二，全国各地、各大专院校里虽然各种思潮争论很激烈，百家争鸣，但究其实质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以蒯大富即“团派”为代表的极左思潮，主张解放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是黑线主导的，是要彻底砸烂的。这一派当时的势力是比较强大的，因为有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撑腰支持。而另一种是以“四一四派”为代表的比较温和，也比较实际的思潮，这一派没有后台，因此处境很困难。这就把清华以至于全国的看似混乱的“派性”争论，上升到思潮乃至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方向、前途等原则的、理论的分歧上了。第三，“团派”思潮因其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而且有中央文革甚至最高领袖的强有力的支持，所以很可能一时取得胜利，能掌权。但掌权以后必然要乱，是不可能长久稳定地掌权的，这也就是毛泽东和中

央所批判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所谓“四一四思潮必胜”的“要害”。其实，经过和周泉纓多次讨论，我们认为，“必胜”还有一组潜台词，就是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所以，是引起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周泉纓的稿子改动得很多，但主要是在逻辑和文字方面改动，其主要论点都保留了，尽管我们的意见并不十分一致。稿子改定后，由几位文工团的同学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反响极大。周泉纓召集所有参加修改、抄写的人开会，他说：“这篇东西由我来承担责任，也确实是我写的，是我的思想，我的专利。我是红卫兵小将，不怕。今后不要说你们参加了，至死也不要说。”他当场把我们修改的底稿及所有文件资料全部烧了。

不久，就有很多传说，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四一四思潮必胜》有看法。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不喜欢“四一四”，他们是支持、甚至是偏袒蒯大富的。直至1968年7月27日蒯大富下令开枪镇压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毛泽东于7月28日凌晨接见蒯大富等五大领袖的记录稿公开之后，我们才看到记录稿中毛泽东批评说：“《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了。它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四一四是右的，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蒯大富的“团派”一直想抓出“四一四”后面的“黑手”，也一直怀疑我和一些人就是“黑手”，他们甚至怀疑我们背后还有更大的“黑手”，不然，怎能这么大胆，把矛头直指中央文革甚至更高层。但他们没有证据，而且虽然毛泽东多次批评了“四一四”，但并没有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和反动思潮。

除了《四一四思潮必胜》以外，还有就是干部问题，因为多数党员和干部支持“四一四”，“团派”十分恼火，一直想搞点事件出来，用以吓唬和压制多数党员和干部。于是就把六名敢于公开亮明自己观点，支持“四一四”的中层干部打成了“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罗是我，文是文学宓（统战部副部长），李是李康（教务处副处长），饶是饶慰慈（党办副主任）。

“团派”得知毛主席批评《四一四思潮必胜》后，很高兴，一方面在学校组织人大张旗鼓地批判这张大字报，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是反革命宣言；同时，他们的专案组开始抓人，首先是抓我，1968年1月30日（春节除夕）专案组把我抓走了。后来陆续也抓了文、李、饶、刘（刘承娴，统战部副部长）、徐（徐一新，科学处副处长，1968年我从三堡疗养院逃跑以后，徐躲进四一四的据点科学馆，幸免于难）。

杨：他们把你抓起来后怎么处置？

罗：我被抓走后，先被关到先农坛国家和北京体育代表队的的一个厕所里，那些运动员很野蛮粗暴，一进去就打了我一顿，说我是流氓。在地下室审了两天，又被转到清华第一教室楼“前哨”广播台所在地（“团派”的广播电台），后又被转到化学馆地下室，在那里审了两个星期，又被转到八达岭的清华三堡疗养院。“团派”的专案组长是孙耘（原名孙毓星），我的案子由他这个专案组负责。这个专案组里还有体育代表队的政治辅导员李天麟等。审我的时候，常常是力学系68届学生孙铮做记录。专案组几乎天天审我，直到3月27日我成功逃跑了。

专案组审我时动用了肉刑逼供。但实事求是地说，因为我被抓两个月就成功地逃跑了，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所以还没来得及对我用重刑。专案组中多数人没动手打我，少数打也主要用拳掌，动用工具打我只有一次，是我被关在化学馆地下室时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突然来两个彪形大汉，我从来没见过（专案组当天没有审我），他们戴着口罩，也不讲话，手持手电筒，用布包着底部，用力朝我的肝、腹部击打，很痛（后来有一段时间尿血），每人打了十多下，低声

商量了一会就走了。外面有守卫的人，但没有进来。我被关在“团派”前哨广播台时，曾看到一本小册子，专讲打人和挨打的，用布包着手电筒底部打肝腹部就是这本小册子里讲的一种可以不留痕迹的打人方法。这本小册子也介绍挨打时一定要放松，不要硬顶，或挨打时就大叫一声，同时顺势倒下，就可以把打你的能量消融释放。我后来就用这个办法对付挨打，但后来被冯家驊发现了。冯家驊是专案组里打人最残暴的学生，个子不高，寸头（文学必说，用老虎钳拔牙的就是他；后来工宣队告诉我，用带钉子的木棍打饶慰慈的也是此人，但他打我时只用了拳掌，下手很重）。

有一次冯家驊打我时，他虚晃一拳，我也大叫一声，他就阴险地笑了，接着雨点般的拳头打得我头昏眼花。他发现我懂得顺势倒下，就在我可能倒下的方向将几把椅子、凳子倒放。叫我看清楚，如果顺势倒下就会被凳子、椅子腿弄伤。这样，我必须硬挺住，挺不住才倒下，身上许多地方就这样受伤了（有的伤到现在还留有疤痕）。

我感觉到，“专案组”里面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的人如孙耘，并不主张打人，但受压力很大，有一次，孙耘正在审讯，孙铮担任记录，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进审讯室，孙耘马上跳起来，左右开弓打了我十几巴掌，并不疼痛，这说明他不会打人，但怕人说“右倾”，是打给别人看的。

最难熬的是罚站，不准睡觉，那是被关在化学馆时，冯家驊对我说，“你硬吧！我们有办法叫你开口！蒋南翔硬吧，老家伙站了三天三夜，快精神错乱了，什么都说了。现在我们让你也试试，看你能不能比蒋南站得更长时间！”专案组人员三班倒，不准我动一动，一天两顿饭也是站是吃，只有大小便时能稍稍动一动。就这样一直站得我两腿肿得上下一般粗、思维混乱、产生幻觉，到三天三夜又八小时（即80小时）时，我再也受不了，我对他们说我要小便，还没等他们允许，我就踉跄地向审讯室后面临时关我的牢房冲去，牢房门口是上下水管和暖气管道的入孔，掀起入孔的混凝土盖板，就是我大小便的地方，我还没有走到牢房门口就晕倒了，但是并非一点知觉没有，我听到一位校医院的医生说，“你们要小心，心跳太慢了，不注意要出事”。一个人说，“没事，他装蒜”。医生说，“心跳慢是没办法装的，你们要注意。”然后有两个人把滚烫的开水灌入我口中，痛得我大声呼叫，睁眼一看是冯家驊，他奸笑着说：“我说是装的吧，没事！”我的口舌喉咙被烫得痛了许多天。

此后，罚站是停止了。审讯还在继续。不过孙耘经常会给我测一下心跳，也许是医生说的话还有点用。

肉刑体罚还不是最可怕的，最无法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折磨。被关在化学馆地下室时，一到夜深人静时，一点声音都没有，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肺的深呼吸声，血液的流动声，甚至似乎听到女儿的哭叫声。我体会到，没有噪音的世界是最恐怖的，就会出现各种幻觉。我宁愿他们审讯我，打我，骂我，也不要这种“万籁俱寂”。

后来，他们又开始给我吃一些药，我不知是什么药。但第一次吃药后，我感觉可能是安眠药。因为吃下去以后昏昏欲睡，第二天就不敢吃了，给我的药被我偷偷地丢进大小便的地方。但是第二天他们给药以后不久，冯家驊突然又来提审，李天麟在旁。这个人没有动手打过我，但常常帮冯家驊出主意。他们给我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印甫盛说过，林彪是极左思潮的总根子。”下面是我的签名。签名似乎是我写的。我一下子陷入混乱迷茫和内疚自责，我不记得我签过这个字条，我紧张地思索了一会，想不出，记不起，何时何地签了这个字条，而且我知道我们一些人中，认为中央文革是极左思潮的总根子是有的，甚至有议论到最高领袖的，但没有谈到林彪，因为林彪是带兵打仗的，不是搞意识形态的。我怀疑是我在罚站到精神恍惚、神智不清时他们拿给我签的字。但无论如何，我不应推给学生。我立刻说，这不是印甫盛说的，是我说的。冯家驊说：“那你写下来。”我说：“我写下来你们得将那个条子退还给我。”在得到他

允诺之后，我写了一张承认曾攻击林彪的“认罪书”给他们，但冯家驊却没有将那个条子退还给我。我被这“一棍子”打垮了。其实，如果他们继续追问，会有更多的收获，因为连攻击林彪都承认了，什么《四一四思潮必胜》，什么中央文革，都已不在话下了。好在他们没有继续追问，而且不久我就逃跑了。但这个思想包袱，一直到“九一三”事件以后，我才放下。

后来，我同文学宓交谈过。他说：他被抓后也被罚了站，站了多长时间他也说不清了，至于挨打，老虎钳拔牙等等，都是确有其事的，他的双腿被打得两年后还没有完全恢复好。饶慰慈被严重伤害致残，至今她不愿提起那段可怕的经历，一提起，她就浑身颤抖，不能自己。至今，我从来也没敢向她提起过这件事。至于刘承娴，说她是跳楼自杀身亡。我并不相信，即便如此，那也是因为她不能忍受那些人对其肉体的残害和人格侮辱等精神上的压力，才会选择自残这条路的。

杨：听说你从三堡逃跑了，这里山高路险，你是怎么逃跑的？

罗：这个地方我比较熟悉。首先修建三堡疗养院时，我去过几次，看望建工系参加劳动的同学，当时（60年）正是困难时期，吃不饱饭，我和同学们常常在山沟里拣山里红吃。又因为1964年暑假，清华学生在南口8321部队当兵（实际是在部队锻炼一段时间），1965年暑假，清华学生又在昌平工程兵技校当兵，这两次清华学生当兵都是我带队。后来清华武装部长何介人让我写一篇总结报告，我就是在三堡疗养所写的，休息时常常在山窝里打小口径手枪和步枪。所以，这一带山窝里我都跑过，地形和路线都比较熟悉。有了这个条件，我一被关到三堡，就在考虑如何逃出去。

我被关在二楼，离底层有三米高。专案组每晚在我底下的房间打扑克，吵吵嚷嚷的。每天晚上12点还有一趟火车从下面山谷通过，因为是山谷，声音很大。

我选择的是3月27日（阴历二月廿九日）晚，无月光，晚上12点，在火车声的掩护下，我从二楼跳了下来，由于没有看清地面，脚腕崴了，很疼。我忍着疼一步一崴地沿着公路往南口走。那时南口到八达岭这条山谷里还有狼，我听到狼叫声，还看到狼的眼睛里的光，有的暗红，有的暗绿，阴森可怕之极。大概有七八只狼一直跟在我后面。到有灯光的地方，狼就不见了。过了灯光，狼又来了。我很害怕，但狼却一直只跟着我，没有伤害我。就这样一直走到南口采石场，灯火通明，机械轰鸣，狼群就再没出现了。我注视着黑暗的山谷，默默地感谢这些把我安全送出南口的狼群。

清早，我向一个看道口的老头打听：“北京到张家口的车几点到？”他说：“往上走的火车9点多钟，往下去的火车得下午。”时间还很早，我不敢在这久等，只好再继续往昌平走，到了昌平，我才坐上了公共汽车回到北京市区。先到人民大学找到我的姐夫和姐姐。从他们那里要了一辆自行车。当时我爱人（梁鸿文）也在人民大学我姐姐那里。我们两人一起骑自行车到建国门外，找她的同班同学林维南（华侨，时任北京日报记者，是阮铭调去的），从他那里拿了钱、粮票和治脚腕的药。当晚，我姐姐、姐夫的同学郁正汶（中国青年报记者）安排我住在他爱人弟弟在三里河的家里，然后他连夜骑车到清华“四一四”总部联络，通报我的情况。“四一四”总部于4月1日把我接回清华科学馆。

杨：这真有点类似小说的情节。

罗：我看过大仲马的小说《基度山恩仇记》，我从三堡策划逃跑时，真的想到，并模仿了小说中一些逃跑的情景。

杨：“团派”不知道你回清华了？

罗：当时不知道。但不能保证长时间不走漏消息。所以我还得东躲西藏。4月23日，清华两派武斗升级，我就从清华跑到广东，在广州住了几天，又到汕头住在一个同学家里一段时间。8月初，我听说因蒯大富下令开枪，已被夺权，而汕头又在驱赶外地人，不能久住，就到广州住在鸿文家里。

杨：你在广州住了很长时间？

罗：是的，直到9月14日，我才从广州回到清华。回去后工宣队（当时掌权）把我送到生物馆的一个房间住着，那时清华中层以上的干部都被工宣队集中关在生物馆的一个大房间，我和他们没见面。

杨：“团派”怎么知道你修改了《四一四思潮必胜》？

罗：我认为他们一直怀疑，但没有证据。10月上旬，工宣队在大礼堂前面草坪批斗蒋南翔。陪斗的左边有高沂，右边是我。校一级斗完了以后，再放到部、处和系级批斗。

“团派”在我被拉出去陪斗以后，就散布说中央已定性，认为“‘四一四’里边有坏人，罗征启就是坏人”。“四一四”这边不知底细，不敢表态，还有人贴大字报，表示要跟我划清界限，大字报只是表态性质，没有实质性内容。万润南不表态，还明确说：“罗征启不是坏人。”

这时，党办、宣传部、政治部准备联合批斗我。他们先要预审一下，李兆汉参加了预审，审我时他偷偷向我使眼色，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第二天在工字厅斗我，李兆汉坐第一排。主持人宣布：“批判会开始，罗征启站起来！”我刚一站起来。李兆汉立即跳起来抢着第一个发言，他质问我：“罗征启，我问你，1967年夏天在二号楼一楼一个大房间里，我一推开门看到你，万润南，周泉纓在里面，桌子上有一大堆稿纸，你们在干什么？”我迟疑了几秒钟，我觉得李兆汉在通知我什么事，昨天预审时没有机会。其实，当时在二号楼干什么，李兆汉最清楚。他是修改人之一。《必胜》里引用的一些列宁的语录就是他找的。我镇静地回答说：“我们在修改《四一四思潮必胜》”。批判会立即静了下来，喊了两个口号，就宣布休会，把我押返生物馆。工宣队表扬了李兆汉，说他一炮把顽固的罗征启打哑了。只有一位同事告状说，李兆汉是在通风报信。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就自由了。李兆汉告诉我，工宣队手里有材料，是周泉纓或者杨忌非（与周同一战斗组的化工系的女同学，周和杨在《必胜》以后又贴了大字报《窃国大盗陈伯达》，就被抓起来了）在监狱里交代说：是罗征启、万润南参加修改了《四一四思潮必胜》。他们不认识李兆汉，所以没有把李兆汉交代出来。工宣队给李兆汉看了周泉纓的交代材料，材料里说：主要是罗征启改的《必胜》，万润南是罗的助手，稿子的主要思想内容是周泉纓的，但是重新组织修改了一遍。

1974年，周泉纓回学校，我问他：“你在监狱是不是说我改了《必胜》？”他不置可否。他又说是杨忌非交代的。杨忌非是支持周泉纓，而且是比较了解我们这些人的情况的一位女同学，周泉纓被抓，她去跟公安局闹，结果把她也抓了。我想实际情况可能是，知道修改《必胜》情况的人都被公安局控制在不同的地方，对这一位说：另一位交待了；对另一位说：这一位交待了。学生没有经验，听公安局说别人说了，自己就说了。这些知情人中，只有万润南一直不承认。“团派”之所以抓我，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必胜》这篇大字报的主要修改人。而毛主席又几次批评了这张大字报。有了“最高指示”，他们当然来劲了。

杨：你从三堡逃跑后，团派一定闹开了锅吧？

罗：我从三堡逃跑以后，“团派”专案组就急了。孙耘等人到我家把我父亲抓走，把我爱人的同班同学林维南抓走了。林维南的爱人刚生孩子吓坏了。他母亲刚从印尼躲避反华浪潮回到祖国，她只会讲印尼话和客家话，不会讲普通话，无法和专案组交谈。她阻挡专案组抓自己的儿子，专案组一脚把老人踢倒，摔伤了。过几天就死了。从林维南和我父亲那里问不出我在哪里，他们又到我家。我弟弟（罗征敷，第一机床工人）正在家里写控告信，控告他们抓人。专案组就把他也抓走了。我弟弟拼命挣扎，他们把他扔到吉普车上。几个人用脚踩，还抓了一把擦车的绵丝塞到他嘴里，再用麻袋套上。拉到清华甲所（“团派”总部）打开一看，人已经死了。他们就把尸体送到北医三院太平间，说：这是反革命分子，被群众打死了。北医三院将死人事件报告了公安局。“四一四”的群众也嚷嚷：说“团派”抓了三人，出了两条人命。“团派”的孙耘和另一个姓王的同学只好到北京公安局自首，承担责任。当时人多手杂，七手八脚，到底是谁打死的，也不好确定。就把孙耘当首犯，送到海拉尔关押，从1968年一直到1979年。这11年间，孙耘有6年是坐牢，其余时间是劳动改造。但是没有正式判刑。孙耘是1962年考进清华，是当年河北省的理科状元。在清华他是个好学生，平时表现也不错，但不知为何加入了“团派”。粉碎“四人帮”后，孙耘事件就成了清华一件有名的大案。

1978年上半年，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刘达找我谈话，让我重新组建党委宣传部（文革前我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在宣传部组建之前，要我先帮他抓落实政策工作（主要是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他说，在清华落实政策阻力很大。很多领导干部自己挨过整，也整过别人。我知道，他说的情况是事实，蒋南翔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但文革前他也整过不少人。何东昌在文革中也被整了，但从1949—1979年三十年间，除了文革中他和所有干部一样被“群众运动”冲击和1974年反右倾回潮运动中批了他右以外，他都有整人的帐。所以，何东昌对平反冤假错案总的来讲并不积极。刘达说：“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很坚决。清华的冤假错案很多，必须彻底搞清楚，否则拨乱反正是很难的。”他叫我在第一线，有困难，遇到问题可以找他，或者找张健、胡启立、汪家璆，他们和文革前及文革中的清华没有多大牵扯，会此较超脱一点。这时我才明白，刘达为什么一方面要启用“清华牌”的干部，一方面又把这几位非“清华牌”的干部调来充实领导岗位。用心可谓良苦。至于我自己，因为我在文革中是受害者，如今恢复工作怕别人说我搞报复，所以要求回避文革中与我自已有关的问题。刘达同意，说：“涉及你自己的事，你可以回避，但总体还得你来抓。”

1978年下半年的一天，有人敲我家的门，开门一看是孙铮（她就是文革中整我的那个专案组的成员，后来和孙耘结为夫妻），她一进门就说：“罗老师，你认识我吗？”我说：“认识，你是孙铮。”她说：“我代表孙耘来向你请罪。当时我们年轻无知，伤害了你和你的家人。很对不起你和你家人。”我问她：“孙耘在哪里？”她说：“还关着。”我问：“为什么还关着？”她说：“他是罪犯，这十多年时间大部分被关着。”我问：“判刑了？”“没有，但案卷上写的是反革命杀人犯。”她的态度很诚恳。我问她：“你找我，希望我做什么？”她说：“我只希望你原谅我们。孙耘如果能出来，他一定亲自来向你请罪！”我家里挤，就把她带到办公室，说：“你等一下。”我写了一封信，写完让她先看了一下。信是写给海拉尔公安局的，请北京市公安局转。因为孙耘是北京市公安局送到海拉尔的。信中说，孙铮来向我道歉，态度是诚恳的，我代表被害人家属，负责地声明不再追究这件事了，请你们释放孙耘。孙铮看了这封信，当场泪流满面。她说：“罗老师，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做。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代表孙耘感谢罗老师。”

孙铮走后，我将这封信通过清华办公信箱送给北京市公安局。我还把这封信给我爱人、父母、姐妹们都看了，他们都同意我的做法。一个月以后，孙铮和孙耘来到我家，孙耘说：“罗老师的信一去，海拉尔公安局就把我放了。公安局看了罗老师的信也很感动。他们说我这十年改

造态度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就把我放了。”我说：“出来了就好，今后好好干吧！”他们说：“我们两人想考研究生，不知行不行？”我说：“我赞成！你们准备得怎么样？”孙耘说：“专业方面我在监狱里有准备，就怕政治课。”我说：“政治课好办。”我立即让政治教研室搞了一份研究生考试的政治课复习提纲给他们。

他们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报考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考试结果出来以后，孙耘、孙铮又来告诉我。孙耘总分第一名，孙铮也考得不错。但是，哈工大看他档案里面有“反革命杀人犯”的记录，不敢录取他。他们对我说：“即使哈工大不录取，我们也满足了，是我们有错。”我考虑了一下，又写了一封信给哈工大党委和黑龙江省招生办，并转黑龙江省委。大意是：孙耘考试成绩好，这不奇怪，他原来就是业务尖子。文革时期，他们二十岁左右，没有人生经验，犯了严重错误，这些年有深刻反省，态度很诚恳，现在刘少奇的问题都解决了，应当是化冤解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了等等。

我把写好的信给胡启立、汪家璆看了，他们也赞成，胡启立还对我说：“看了你的信很感动，我和家璆说要向你学习。这样一来，清华两派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我还把这封信给何东昌看（他当时是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他指着稿子说：“严重错误？是罪行！你怎么连‘罪行’两字都不敢写？难道杀了人还是严重错误？”我当场拿起笔把“错误”该成“罪行”。胡启立说：其实你不必给他看，你自己表态就行，和他没关系。后来我还是把“罪行”又改为“错误”（我当时想，如果这些学生是犯了“罪行”，那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算什么呢？）党委书记和校长刘达当时出国了，事后我把原稿给他看。他说：“我不赞成，这些人当时都疯狂了。应该让他们坐牢坐到六十岁以后再出来，否则他们还会找我们麻烦。”我说，“如果说疯狂，我要问，好端端的一个共和国、共产党，搞成这个样子，是谁先疯的？”刘达不语，他的秘书王乐铭在旁听我们交谈，插话说：“是毛主席，毛主席先疯的！”静默了一会，刘达说：“那倒也是。”

信发出去后不久，黑龙江省委派来了两个人找我，查询这封信的事。我说：“这信是我写。孙耘是个才子，年轻人犯错误，已经惩罚了十几年了。像这样的人，拉他一把，就成了人才；推他一把，就成了社会负担，何必呢？”他们说，省委书记杨易辰看了信还是不敢定。送到中纪委王鹤寿那里，王鹤寿又送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批示：“这是个好事，责成中纪委第二办公室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给黑龙江省委和哈工大党委，这两个学生可以录取。这样的人才应当爱惜。此事可以登报。”（当时我没看到耀邦批示的原件，只看到了新华社记者唐贤美手中的一份文件）

一大群记者拿着有这个批示的文件找我，谈登报的事。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是“第一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同期学习的有尉健行、田纪云等）。我认真考虑后，给耀邦回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但您让登报的意见，我认为不妥。当前全国打砸抢的遗留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这件事一登报，容易造成文革中的问题一风吹的结果，可能造成反复。如果您认为有必要，登个内参就可以了。

信写好后，仍请那位新华社记者唐贤美带回去呈耀邦，听说耀邦又立即批示同意。后来新华社“大内参”登出来了。

杨：是哪一期？

罗：哪一期我记不太清，大概是1980年9、10月间，或者更晚一点。新华社记者唐贤美送来一本，党校同学传着看，最后不知传到哪里了。

杨：这件事受惠的不仅仅是孙耘和孙铮吧？

罗：当然，不只是他们两人。据我所知，北京航空学院造反组织“北航红旗”的二把手井岗山也被哈工大录取了。

杨：孙耘一定会从心里感谢你。

罗：孙耘和孙铮被哈工大录取后，专程来看了我。此后他们每年都到清华来看我。1983年以后我调到了深圳，他们还常常到深圳来看我。他们写的论文也都寄给我。

杨：我听胡德平说，孙耘每年还到胡耀邦家看望。

罗：这是应该的。如果没有耀邦同志的批示，他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1982年孙耘找过我一次。说学校让他去美国深造，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这样的事还问我干什么？”他说：“我今天的一切都跟你的宽容有关。我必须听取你的意见。”我问他：“你自己的意见呢？”他说：“我不想去。”当时，我已经知道全国正要清理“三种人”，像他这种情况，估计出国审查这一关不好过，或者是出去了又要被叫回来。王炳璋等人就是叫他们回来时跑掉的。我说：“我同意你的选择，你们先干出些成绩再说吧。”

孙耘事件妥当处理好后，清华的派性问题也顺势很快解决了。1982年我回清华继续担任清华党委副书记。我问车队长：“小李现在怎么样？”（小李是给校领导开小车的。抓我弟弟时他开的车，塞到我弟弟口里的绵丝是他找来的。所以他一直都不敢见我，他爱人为此事很紧张，一度精神失常。）车队长说：“他还开小车。我不敢让他给你开车。”我说：“我明天用车，你让他来接我。”“不行吧？”队长很犹豫。我说：“行！”第二天小李来了。我说：“孙耘问题解决了，这件事就算完了，你不要再背包袱了。”

2005年，孙耘夫妇带着女儿在北京请我吃饭，共有12个人参加，有“团派”的，也有“四一四”派的，气氛十分融洽。席间，孙耘请我和他们全家一起照相，并对他女儿说：“你要记住这位爷爷，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家，你一定要记住！”在场的人十分感动。

粉碎“四人帮”后，我同“四一四”的骨干及文学宓、李康、饶慰慈等人多次交谈，他们都很赞成我宽厚处理孙耘一事，说文革中清华两派杀红了眼，仇越来越深，怎么办？胡启立到清华任党委副书记时，让我代表“罗、文、李、饶”等受害的干部控诉蒯大富，还说：控诉可以，点蒯大富一个人的名就行了，其他人都不点名了。蒯大富也只点一次。他们都是年轻人，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环境下犯的错误。

清华两派的对立情绪消除得比较快，派性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两派的头头都认为，这与耀邦同志对孙耘问题处理得好有关系。

另外，孙耘最近给我来信说：“如果没有耀邦的批示，也没有我的今天。我要把这一件事情写出来，我曾到哈工大查档案，你的信都找着了，但不让复印。耀邦批示的原件没有找到。”

~~~~~

【史实辨析】

我亲身经历的北大文革中的保卫组和“7·10”事件

• 蓝绍江 •

最近在网上偶尔看到一篇文章，名曰《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注明来源是《华夏文摘》增刊第762期，发布时间2010年8月11日，作者“薄亚达”（估计是化名，取北大“博雅塔”谐音）（见本刊zk1008b——编注），该文中提到了北大1967年7月10日的群众“造反派”组织查抄北京大学保卫组事件，原文摘录如下：

“反聂派一旦派生，便虎虎有生气，团、零、飘、井、红各自为战，又互相呼应。他们对聂元梓镇压“井冈山”、“红联军”进行了清算，为许多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进行平反。7月10日，北京公社查抄了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又称二组），抄出了两批构陷学生、教员为反革命的“黑材料”。此事震动了全校，周培源闻讯赶到了现场，见状十分激动，情不自禁地挥起拳头，高呼道：“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

看完这段文字叙述后，我突然意识到：几十年过去了，还有些人带着根深蒂固的“文革”烙印和派性发表些貌似公允的史料，若都如此，再历经若干年，后人只能依据一些偏颇、失真的史料审视和评价那段特殊的历史，岂不要误入歧途？为此，我把自己亲身经历“文革”使得北大保卫组和的北大“7.10”事件公诸于世，以纠正因情绪偏颇而失真的一点点史料。

首先简介一下当时的北大保卫组和我是怎么到的保卫组：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北京大学开始“沸腾”。当时我们法律系63级学生还在郊区参加“社教工作队”，被连夜召回北大。一进学校就懵了！到处是大标语、大字报，到处揪斗老师、揪斗领导，而且伴随着侮辱、打骂，学生也因不同的看法而互相“辩论”，校园里从早到晚一片混乱！不久，中央派了工作组进驻北大。有个人总是出现在揪斗干部、教师的现场，制止武斗、宣传“文斗”，我很佩服那人的胆量，敢在那种极端无政府状态下挺身而出，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后来听说那人叫“张承先”，是工作组组长。可是到了1966年7月25 / 26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东操场主持了两次“大辩论”，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等等等那些重量级人物全来了，最后他们在大会上宣布工作组是“镇压革命”，宣布张承先，还有张文秋是“坏人”，宣布撤销工作组。

工作组撤销了，但是工作组时组建的“保卫组”（当时称“二组”）因保卫工作的特殊需要被批准保留下来——当时“二组”是由海军保卫部、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组成，不参加学校“文革”运动，专门负责学校安全保卫工作（维护校内治安、配合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承担重点专家、要害部位及来校首长、外宾的警卫）。就在1966年8月初，我接到系里通知，到二组参加保卫工作。我记得当时抽调校内人员一共3个人，有2名原来的学校保卫干部，学生当时只有我一个（因为我从未写过大字报、从未揭发批斗过老师）。从此我就同安全保卫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整个“文革”期间循规蹈矩地工作，没有参加过一次批斗会，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出去到各地“大串联”；但是我却在踏踏实实的工作中从部队、公安、老保卫干部那里学到了勘验、照相、文检等业务知识，（1968年12月毕业离校）毕业后因此进入了公安刑警队伍。

1966年底，北大保卫组的军队干部按照中央批示撤出北大，学校又陆续抽调了部分教师、干部充实保卫组，正式取消二组称谓。保卫组名义上隶属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是当时经中央批准成立的学校领导机构），但实际上延续了原二组的工作性质和任务，接受市公安局和公安部的业务指导，独立工作，不参加校内群众运动。保卫组从来没隶属于任何群众组织，包括“新北大公社”，前面摘引的文章中提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又称二组）”的称谓纯属编造。

1967年7月9日是星期天，保卫组长谢甲林回家了（在市内），我和董希成等二、三个住校人值班。7月10日凌晨约3点钟，我听到保卫组（燕南园63号）院外人声嘈杂，又看到不少学生宿舍开着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就出来到校园巡查。（巡查校园是我们的职责）我顺着声音方向来到了“大饭厅”（学一食堂），里面灯火通明，饭厅中间一大群人席地而坐，陈伯达就在中间（陈伯达何时来北大，我们事先一无所知）。我扫视一圈，发现许多群众造反组织负责人们都在现场，七嘴八舌地争相向陈伯达汇报和互相争论。我只顾注意巡视周围，害怕出现安全问题，对他们具体争论什么没太上心。就在将要结束时，忽听在场的一个叫“雷振孝”的人（据说是“井冈山”的宣传部长）对陈伯达说：“我们北大有个二组，专整群众黑材料！”陈伯达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让他们停止工作！”当场有人鼓掌。听后，我为之一惊，因为在当时形势下，就是陈伯达这一句话，意味着新的打砸抢和揪斗就要开始了！！

在他们还没有散去之际，我匆匆回到保卫组，叫醒值班的其他人，向他们简要通报了情况，大家都明白，马上就会有大批人蜂拥来封门、“抄家”。我们担心保卫组的档案资料被盗抢丢失，里面有“文革”开始以来校内发生的各种刑事案件案卷、“文革”开始以来校内自杀人员现场勘验资料、警卫工作记录、中央及北京市公安局有关保卫工作的通报、文件、批示等重要材料；还有一部分为侦破校内刑事案件开展笔迹筛查、鉴定而从有关系部门借来的档案、大字报底稿等文字资料（作为笔迹样本）。我们对最后这部分资料的具体内容不清楚，而且必须用后归还各部门，不能丢失、扩散。当时我们估计到已经被包围或监视，资料已经没有时间妥善转移。于是，我们二个年青人商定，把这部分搞不清内容、又必须归还的文字样本资料包裹严实，暂藏到院内和卫生间等处，打算过了风头再起出归还。

果然，天刚亮就来了大批学生涌进保卫组，宣布：“根据伯达同志指示，保卫组停止工作，我们代表革命群众查封保卫组！”尽管我们一再解释，保卫组不介入群众组织派性活动、保卫工作资料的重要性和保密性等，但是毫无效果。等谢甲林同志来了以后，我们就被全部被“净身”赶出保卫组，保卫组业务档案、勘验与摄影器材及个人物品全部被扣留。（北大的保卫工作被迫停止了一段时间，后来因工作需要而被批准恢复——此是后话）

事隔半个多月之后，突然有大字报贴出报料：在“黑二组”查出被隐藏的“大批黑材料”！我知道是我们暂时隐藏的借阅资料被发现了，遂向谢甲林同志作了汇报。我们保卫组当时的工作纪律是：每个人思想上可以有“观点”，但工作中不能有派性，保卫工作不能受所谓“运动”的影响。正因为我们不搞什么“黑材料”，自己心里有底，所以我们向全校告示：保卫组从来没有搞过构陷学生、教师的“黑材料”，并强烈要求有关群众组织公布这些所谓“黑材料”的内容。这一告示发出，铺天盖地的所谓“黑材料”风波戛然而止了。

直到今天，也从来没有任何组织能拿出保卫组构陷群众的“黑材料”公布于众。至于周培源当时是否激动得挥起拳头，并高呼道：“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我不知道，当然这也绝不是什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因为这是陈伯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恶果。

我早就丢弃了派性（1967。7。10以后曾有过），我觉得当时的“派性”实在幼稚、无聊，我和我的同学（无论当时何派、何组织）相处得一直都很融洽。我也希望现在还有些当年派性痕迹的同学、学者，摒弃幼稚可笑的“派性”思维，用严谨的态度和理性的语言文字客观地记录那段特殊岁月的史实，以利于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让悲剧重演，共同构建社会的和谐、推动祖国的发展，绝不要再让陈伯达们的幽灵继续游荡了！

（2014年元旦）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